

作为体育强国,今天的中国,在各大国际赛事上争金夺银,风采飞扬,但实际上,体育作为一项相对明确的事业在中国发展,也不过始于一百多年前。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的兴起,促使一些近代体育项目,被作为军事训练手段引入中国。随后百年间,我国的体育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,又有哪些人投身其中,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呢?

从长衫裹脚走向体育强国

张伯苓:超越时代的眼界气魄

张伯苓照片

张伯苓的“体育”之道

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、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张伯苓,是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先驱之一,早在1908年左右,他就跟同仁们提出了著名的“奥运三问”：“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?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独得锦标?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?”试想在那个男人穿着长衫、女人裹着小脚的年代,能提出这三问的,得是何等有远见有壮志之人呢?张伯苓能有如此超越时代的眼界和气魄,与他少年时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,和之后上船服役的经历密切相关。甲午海战之后,日本跟英国私下达成交易,把本应还给中国的山东威海转租给了英国,在交接威海的过程中,张伯苓作为北洋水师官兵,随船护送清朝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,因此在现场目睹了整个交接仪式,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他们的太阳旗降下来,中国把龙旗升上去,象征性地挂了一天,就被英国的米字旗替换了下来,作为一个有

血性的中国人,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列强欺辱,张伯苓心里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愤恨和耻辱感,而让他备受刺激的,还不止这些。张伯苓的曾孙张鉴灏说:“交接的时候两边都有仗仗队嘛,张伯苓看到英国兵高大挺拔,皮鞋锃亮,特别精神一身傲气,再看中国兵,矮小佝偻,破衣烂衫,而且当时中国大部分官兵都不觉得国家蒙此大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,都很木然。”

军队孱弱凋敝,士气低迷懒散,令张伯苓从军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碎了,威海交接仪式后不久,他愤然辞去北洋水师军官的职务,回到了家乡天津。痛定思痛后,张伯苓决心投身教育事业,用知识开化人心、靠体育强健体魄,进而提升中国人的精神面貌。他认为,当时中国人身上的弊病,总结起来大致就是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五个方面,而体育竞技项目,既能强身健体、磨炼意志,又能培养团结协作等精神品质,是克服这些弊

病的一个极佳的切入点。1898年,张伯苓被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教书先生,那一方小小的四合院,成了他践行自己体育教学理念的理想天地,每天,他都会拿着各种木质器械,或用椅子架起一根棍子,让孩子们盘起辫子、挽起长衫,进行跳高等各种体能训练。

1904年回国后,2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,创办了南开中学。一时间,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在南开校园风靡开来,从篮球、足球、棒球、冰球、垒球,到单双杠、武术,甚至是火棒舞,学生们都能接触到,其中不少项目,还在张伯苓的支持下成立了社团。在张伯苓看来,体育就像是人们彼此交流的一种特殊语言,总能迅速激发出共鸣与热情,以体育人,育的不仅是体魄,更是一个人追求公正、尊重规则、团结包容的道德品质,和坚韧不拔、昂扬向上、永不服输的精神内核。

体育发展 器材助力



春合体育和张伯苓

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公司,其前身春合制球厂,成立于1922年,创始人傅泊川与张伯苓关系十分要好,二人体育救国的理念高度契合,为了抵制昂贵的进口运动器材,生产接地气的体育用品,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,傅泊川与几位同姓亲戚合资,在南开中学对面租下两间门面,成立了春合制球厂。

当时,南开学校名扬海内外,张伯苓本人和南开的许多运动员都曾为春合义务做过广告,1932年,刘长春还曾代言过春合的产品。一时间,春合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体育用品品牌,抗日战争时期,春合即便冒着炮火,也依然在坚持生产。

随着时代和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,春合的产品持续更新换代,从早期的球类、服饰,到后来的鞍马、平衡木、吊环等体操器材,品质性能均达到了国际标准,在材料和技术都比较匮乏的年代,春合的老师傅们常常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,在数十种材质、上百组数据中反复摸索调试,甚至是自己动手加工原材料,才能最终收获理想的效果。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,到1990年亚运会,再到1999年的体操世锦赛,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各大赛事上,都不乏春合体育器材的身影,这个历经风雨的老品牌,陪伴了中国一代代的体育健儿,也见证了无数个属于他们的巅峰时刻。

从长衫裹脚、不知体育为何物,到全民健身、体育强国,从提出“奥运三问”,到实现三问中的最后一问——奥运会在中国举行,中国走过了崎岖而动人心魄的一百多年,以张伯苓为代表的一批先驱,竭尽全力,唤醒了国人对体育、对生命的热爱,其影响直至今日,依旧绵长。

图片由《津云调查》节目组提供

越挫越勇的中国健儿



南开五虎

在张伯苓的学生中,以南开五虎篮球队为代表的各支运动队,都曾在赛场上取得不俗的成绩,但这从来不是孩子们一味苦练出来的,而是“玩儿”出来的,所谓“南开会玩儿”,指的就是通过激发兴趣,让学生领悟体育的乐趣,如此一来,不论多苦多难的项目,都会像充满趣味的游戏一样,魅力十足。当年,每到冬天,南开大学的湖面上结冰之后,全校师生就会自发地组织冰上化装舞会,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服装,踏冰而行,翩翩起舞,吸引了众多天津本地,甚至是从外地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参与其中,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,就像一簇簇火焰,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不安、身处苦难的中国,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。

自从清朝末年提出“奥运三问”,张伯苓等人在之后二十多年的光阴里,始终怀揣奥运梦想,奔走呼吁、苦苦求索这三问的答案,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国内军阀混战、列强横行,政权更迭频繁,以国家名义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,难免会受到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重重干扰,因此一直未能成行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傀儡政权,在我国东北建立起伪满

洲国,国家命运岌岌可危,可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,正是在这个山河破碎、民族危亡的关头,中国的第一位奥运健儿诞生了。1932年7月,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、短跑健将刘长春,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,由此成为中国的奥运第一人。

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,日本人一直在寻求机会,为伪满洲国争取国际地位,于是很早就盯上了刘长春,想让他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当年的奥运会,通过这种方式,提升伪满洲国在世界上的曝光度和认可度。尽管刘长春明确表示拒绝,但日本人始终不死心,甚至多次联系刘长春的父亲,企图迫使刘长春就范。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,张伯苓等人十分清楚,必须尽快筹到钱,资助刘长春以中国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,彻底

断了日本人的念想。正在此时,一直视张伯苓为师的张学良拿出8000元钱,促成了这件事,中国人热切期盼的“奥运三问”中的第一问,自此有了答案。

尽管因为行程仓促、舟车劳顿,刘长春没能拿到理想的名次,但在很多人看来,从他代表中国站奥运赛场上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已经赢了,赢在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,赢在向全世界、向侵略者彰显了中国人奋发拼搏的精神面貌。1934年,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,当时,正处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,东北地区许多高校的学生流离失所,南下天津,来到南开继续学业,此时大家团结起来,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会,自然是意义非凡的。

在国家命运沉浮不定的岁月里,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体育精神,融入了每个南开学子的血液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日军对南开校园展开轰炸,眼看着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,张伯苓毫不气馁,61岁的他在演讲中振臂高呼:“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,南开之精神,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!”直到今天,张伯苓老校长的体育精神和他不屈的风骨,依旧是南开校园里不朽的传说。

津云新媒体、天津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与《每日新报》联合推出

总监制 印永清 监制 彭康华 王军 李强 制片人 白冬梅 王博 李睿哲 编辑 宋新新 记者 宋新新 摄像 曹希民 李钢

版权声明 本栏目所刊载的内容,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、摘编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报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